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13.02.004

我国回流农民工研究综述^{*}

齐小兵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社会学所,北京 100206)

摘要:受农民工的代际更替、产业政策、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农民工回流逐渐成为一个新的发展趋势;同时,受限于二元分割的城乡制度,中国农民工反向迁移的比率或者说潜在比率要远远高于国外。目前,关于中国农民工回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回流规模、回流原因、回流农民工群体的特征以及回流的社会影响等方面。总体上看,中国农民工回流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过多地侧重于宏观层次的回流原因分析与回流影响的考察,而缺少对回流农民工个人层面的具体分析,还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调研分析与经验考察。

关键词:回流农民工;劳动力迁移;推拉理论;主动回流;被动回流;社会资本;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农村发展

中图分类号:F241.22;F3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3)02-0028-07

正如 Lee(1966)所说:“任何一个迁移潮流都会伴随一个相反方向的反迁移潮流”。自从1984年中央正式准许农村劳动力自带口粮到城镇寻找工作机会,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民工数量从几百万猛增到2.5亿^①。虽然“打工潮”在中国仍在继续蔓延,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是,中国农民工正在悄然回流。

农民工外出打工曾被学者誉为继土地家庭承包制度、乡镇企业之后中国农民的“第三次伟大创造”(黄平,1997)。传统迁移理论认为乡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包含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是劳动力从迁出地转移出去,第二个过程是这些迁移者在迁入地定居下来。在完全市场化的假设下,已经迁移出去的劳动者没有理由再回到工资水平较低的不发

达地区,但中国存在着两个独特的政策变量——户籍制度和土地非私有制度,导致这个迁移过程产生了变化。中国农民工所面临的实际是:在完成第一个过程后,他们并不预期能够完成第二个过程。所以,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与其他国家类似过程的最大不同点:它是一个既有流出又有回流的过程(蔡昉,2001;周霞,2005)。

一、农民工回流的历史与规模

农民工回流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政策变动与经济改革,我国发生过多次民工“回流潮”。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90年代初期乡镇企业转型以及90年代中后期国有制企业的改革,都促使中央对城镇人口

* 收稿日期:2012-12-17;修回日期:2013-01-2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12CZX014)“制度正义视域下农民工机会公平问题研究”

作者简介:齐小兵(1985—),男,江西上饶人;博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社会学所学习,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研究。

① 农民工具体数据参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1年我国农民工调查监测报告》。

实施严格的压缩政策,不少城市出台了限制农村劳动力进城的政策措施,使许多已从农村转入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又重新流回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的逆向回流(金莎,2009;于晓媛,2003)。而最近一次的“回流潮”则源于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沿海制造业企业大量倒闭而导致农民工出现一个回流高潮。

众多调查研究表明,绝大部分农民工认为他们最终都会返回家乡定居,这个比例大概在70%~90%之间(朱宇,2004;李若建,2007;任远,2006)。即使按照最低回乡意愿70%计算,乘以中国现有外出务工农民工15863万这个基数,那么将有1亿1千多万外出农民工最终会返回家乡。假定中国外出农民工劳动年龄为18~45岁,则共有28个年龄段的农民外出务工,那么每年大概有560万左右的农民工返乡之后不再外出^①。这个估算的数字仅是指那些因为年龄原因被城市劳动力市场排斥出去的规模,如果加上那些怀揣打工“积累”希望在家乡发展的主动提前返乡的农民工,这个数字将会更大。

然而迄今为止,关于中国回流农民工的规模并没有定论。蔡昉(2000)在苏北地区的调查认为接近四分之一的农民工返回了家乡;赵耀辉(2002)根据在四川、湖南等6个省824个家庭进行的调查数据分析认为返迁率为38%;Murphy(2000)则根据在江西、湖北、安徽、四川四省的调查估计有36%的迁移者最终返回了家乡;Wang和Fan(2006)在安徽与四川的调查显示返乡率为28%;周皓和梁在(2006)利用2000年五普数据分析认为,返迁人口大约占所有省际迁移人口的5.276%,占全国人口的0.1446%,因此,全国返迁人口的大致规模为180万人左右。

在上述调查数据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就在于如何界定回流农民工。农民工回流并不是劳动力迁移过程的终结,回流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过渡性的策略。对于那些由于年龄原因被排除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退休”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回流是永久性的;而对于那些尚能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寻找到工作的人来说,他们很可能在比较回流与外出打工之间的收益差异后重新选择外出打工。他们可能在找不到合适的城市工作或为了完成人

生阶段性目标(包括结婚、生育、赡养老人等)临时回家,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外出务工(墨菲,2009);他们在回流与外出之间可以随时切换(白南生等,2002)^②。为了能够有效地将这些非永久性回流农民工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区分开,目前有学者使用“返乡时间”作为标准来进行测量。那些因为个人或家庭原因短暂回乡的农民工在处理完家乡事务后迫切期待重新外出务工,他们很难在一个整年度里都呆在农村,只有那些还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摇摆不定的人会希望在家乡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呆上一段时间试试看。基于这个原因,已经有学者明确提出将调查时上溯一年内没有出去打工的群体定义为“回流者”(金莎,2009;赵耀辉,2002)。也有部分学者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将未外出时间规定为6个月,这主要是与人口普查的定义保持一致,从而可以对回流者进行全国性的研究(段成荣,1999;周皓、梁在,2006)。笔者认为,使用6个月作为时间衡量标准很可能会错误地扩大了回流农民工的范畴,那些半种地、半务工的农民工以及回乡处理家庭事务的农民工可能由于在家滞留时间的延长而被错误地归入回流农民工,而相比之下采用一年内没有外出务工作为测量标准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选择。

二、农民工回流的原因

迁移并不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劳动力回流与外出迁移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是来自于一个母体中的两个相互作用的力量博弈,两者共同作用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正是基于这个原因,目前关于迁移动机的理论基本上都可以用于反推回流动机。

推拉理论曾被广泛用于解释中国农民工的迁移动机。根据推拉模型,Dustmann等(1996)构建了一个利益最大化的生命周期模型来分析劳动力外出和回流。假设迁移者在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通过收益和成本的比较来选择自己的劳动地点,并做出相应的迁移决定,回流的决策主要受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家乡和目的地的相对收入水平、迁移者在城市积累的只能在家乡发挥显著作用的人力资本、迁移者的主观偏好。在个体劳动生涯中存在着一个可能性的时点,在这个时点上,劳动者通过

① 按照农民工劳动年龄计算回流劳动力规模受到贺雪峰等著的《农民工返乡研究》的启发。

② 白南生等人的调查显示:一半的回流者表示只要环境条件适合,将可能再次外出。

收益和成本的比较,会做出回流的决定。根据这个模型,张宗益等(2007)认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是“农村拉力”、“农村推力”、“城镇拉力”、“城镇推力”四个方面力量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早期研究显示,土地减少、人口增长过快等农村推力因素与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劳动力市场的放开等城市拉力因素是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两个最重要原因。在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的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着农村方向的拉力与城市方面的推力,但它们的影响力较小。而自2005年以来随着国家政策转向扶持农业与“刘易斯”拐点(即农村工资收入开始上升)的到来,城乡两者之间的推拉力强度产生了相反的变化,农业收入上升、乡土传统、家人团聚、就业机会扩大等农村拉力与制度歧视、社会排斥、相对收入下降等城市推力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的回流。

李强(2003)和蔡昉(2008)等人从农村劳动力迁移过程的角度出发,认为推拉理论预设的前提是劳动力市场的自由流动,而在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场域中,户籍制度的限制导致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形态呈现出与传统推拉模型不同的结果。农民工选择定居城市还是返回农村,不仅来自于“个体的迁移动力”,也受到“制度合法性压力”的制约。户籍制度与城市高定居成本导致了大部分农民工的回流预期;同时,农民工也不是基于在城市定居的考虑而外出工作,而是倾向于在城市中尽量多赚钱后回家生活。

基于完全市场化假设的传统推拉理论并不能有效地解释迁移动机中嵌于社会结构中的非经济因素,为解决这个问题,兴起于1980年代以Stark为代表的新的迁移理论从相对贫困、风险分散、社会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劳动力迁移动机。循着这种思路,有学者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于农民工回流的影响。通过对全国9省13个县的农民工调查,马忠东(2001)认为相比务工收入,农民工在外务工中所累积的技能、管理经验、关系等社会资本对农民工返乡决策更有影响力,在外务工获得的社会资本越多,越有可能推动农民工在家乡进行创业或从事个体经营。墨菲(2000)在江西省万载县的调查则侧重于研究务工权利在家庭决策中的不均衡分配,男权文化以及城市工作的性别歧视导致了女性务工者在家庭中的弱势地位,一旦家庭出现变故,女性

更容易被剥夺务工权利而返回家乡。Woon(1993)考察了珠三角开平县的两类农民工,包括从事工作不稳定的低收入的建筑工、工厂女工和在当地创办企业、开展个体经营、承包土地的拥有相对稳定工作与收入的农民工,发现两个群体都表现出了强烈的回归意愿,将其其原因归之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方面:在宏观方面是户籍制度与集体土地所有制(土地不可交易,放弃土地又无法享受市民待遇);中观方面则与乡土观与社会网络有关,他们基本上还是故土导向的;微观方面则是家庭决策与风险分摊等,比如农民工汇款与春节回家,都导致了其强烈的回归意愿,他们不愿意与家乡划清界限,而这既是原因也是结果。因为无法获得城市户籍而不得不保持与家乡的联系,而与家乡联系的紧密又加强了他们的“回流”意愿,Woon将这种双向的循环称之为“累积因果”(cumulative causation)。

如上所述,我们发现,尽管学界对于农民工回流原因的探讨已经从单一的推拉模型转向了更加多元的综合分析,但也仅限于对农民工作出回流或继续务工决策的一个特定时点的考察。如果从农民工的整体生命阶段来看,我们会发现,与传统迁移理论所认为的迁移者在做出迁移的决定时就已经明确了在迁入地居住的意愿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农民工而言,受乡土传统与城乡二元分割结构的制约,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这么一个信念:外出务工只是一个临时性的安排,他们在收入高的地区打工积攒收入,到一定水平上就返回故乡。而收益波动或者城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等因素只能起到一个加速或减速他们回流的作用,这些因素很少能够改变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确的返乡的决定。

三、回流农民工的群体特征

对于回流群体的特征的研究,争论聚焦于他们到底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换句话说,他们到底是“主动回流”还是“被动回流”。

“失败论”观察者从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性”角度出发,认为回流农民工是被市场筛选后低于劳动力市场进入门槛的那批人;回流群体被认为是“失败的冒险者”与“回到家乡的退休者”,他们对于经济发展并没有多大贡献,成功者将继续留在迁入地工作而不是返回家乡。白南生和何宇鹏(2002)对国内的返乡农民工、农民工和从未出去务工的三类

人群的比较研究显示,外出人群与未外出人群在性别结构、年龄构成、婚姻状况、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而回流人群在人口学特征方面更加接近于未外出人群而不是外出人群;同时,回流农户的平均经济水平明显低于外出农户,与未外出农户不相上下;而且,只要环境条件适合,一半以上的回流劳动力可能再次外出。夏怡然(2010)则通过在温州的调查大致描绘出“回老家定居的农民工”的具体特征是:1980年之前出生,收入水平较低,在打工城市的社会融入程度较低,已婚以及来源地与目前打工城市的距离较远。

“成功者”的回流是基于回流收益要大于外出打工收益的预期。研究者认为,劳动力的回流是一个理性选择的过程,是在比较城乡收益后的一个主动性的、积极的策略;而“失败者”一般不愿意承认自己在城市生活的失败而选择留在迁入地(Wang et al,2006)。有关回流农民工的调查显示,更多的农民工开始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创业意识与提高自己的技术。马忠东(2002)认为,受教育程度较高、在外获得较多的技能、关系等社会资本的务工者处于家乡与务工地的节点上,他们在城市中获得的社会资本成为联系迁入地与迁出地之间的桥梁,促使他们在家乡更容易实现创业或自我雇佣,进而导致这类群体更容易回流。周其仁(1997)的调查表明,约有51.6%的进城农民工抱有“在城里闯荡一回,以后回家乡办企业或找个好工作”的意图,对他们来说,掌握本事的重要性甚至高于挣现钱,他们直截了当地把进城看成积累知识和经验、扩充阅历的“投资”机会。葛晓巍和林坚(2009)的调查表明,回流农民工多为年纪较轻、文化水平较高、自身能力和社会关系均较高的劳动力,且女性略多。而周皓和梁在(2006)的研究也显示,农民工回流与受教育水平成正相关,受教育水平越高,越容易返乡。

区别于“成功者”与“失败者”的二元论,一个新的观点是回流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既不偏向于迁移群体,也不偏向于未迁移群体,他们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而是两者的混合,他们需要被重新分类。回流群体既有“带着失落的情绪与空空的钱袋返乡”的失败者,也有在家乡投资设厂荣升为企业家的成功者(墨菲,2009)。回流者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迁移年限、迁移地、职业与技

能、回流原因以及技能经验获取方式方面都存在多样性(Chen et al,2010)。如果说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劳动力是最优秀的,而继续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是最差的,那么“回流者”就是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被淘汰下来的“最优秀中的最差者(the worst of best)”,是农村劳动力市场中的“最差中的最优秀者(the best of worst)”(Borjas et al,1996)。

四、农民工回流的社会影响

与有关回流农民工到底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争论相对应,对于农民工回流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与后果的研究同样也存在着分歧。认为回流农民工主要是“失败者”的研究者强调回流对于农村的毫无作为甚至是负面影响,而认为回流农民工主要是“成功者”的研究者则认为回流能够为不发达地区带来先进的技术、经验、观念与发展资金,从而促进城乡的平衡发展。

大部分的研究者对于农民工的回流持赞赏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回流农民工的外出经历是一种特殊的“城市津贴”:他们“洗脚”进城、“洗脑”还乡(李翔,2009)，“带着资金、技术、信息及新观念返回农村”从事创业或成为个体工商户(石智雷等,2009),能为“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一种崭新的模式”(胡显中,1998),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加速器”(陈如,1996)。虽然回流者受到户籍制度等制度限制的影响而在城市有着不好的生活体验,但他们仍然是社会变迁的有力的代理人;即使是重新从事农业经营的回流农民工,城市迁移经验对于他们的现代性的塑造仍然起着积极作用。他们面对不合理的劳资关系,选择“用脚投票”,这可以从一定程度上促使资方做出让步,提高农民工的待遇(许胜飞,2005)。他们“促进了传统村落文化的变异和新的村落文化的重构,缓解了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带来的社会问题”(秦德文,1994)。

也有部分学者对农民工回流持悲观态度。白南生等(2002)通过全国范围的调查认为数据并不支持“创业神话”,虽然很多外出者曾经有过回乡创业的梦想,但事实上,绝大部分回流者回到了传统经济结构之中,返乡创业只是个别现象。西部地区“明显的大规模的回乡创业的潮流还没有明显出现,因而并不构成外出劳动力回流的一个重要拉力”(张茂林,1996)。农民工回流之后,“有一半的

积蓄用来盖房子和家庭日常开支”,其务工收入也没有被有效地应用于能够带动其家庭长期发展的投资中(王西玉等,2003)。回流者既不会将他们的资金用于农业的改进也不会去创建农村企业,他们唯一的渴望似乎就是为自己盖一个新的奢侈的房子,回流者只是起着—个农村的“化妆品”的作用^①。大体上,“回流”农民工对于农村发展的贡献被远远夸大了,虽然他们的确带动了农业的发展,但也同时“增加了土地的负担”(刘铮,2006)。农民工大量回流,会造成“农村人力资源浪费的问题”,延缓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是“城市化的一种反动”(李家祥,2007)。

总体而言,回流农民工对于回流地区的社会经济的不同影响在于他们的人力资本的不同。正如Lockwood(1990)所指出的,不管是国内迁移还是跨国迁移,都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的选择机制。那些被筛选后低于劳动力市场进入门槛的回流者被迫返乡,他们并没有在迁移过程中提升自己的人力资本要素,所以不管是否有无积蓄,这些回流者返乡后基本上都不会与那些非迁移者有什么明显的差别。而对于那些比较了回流收益要大于外出务工收益的主动返乡者而言,他们在返乡前就已经提前规划好了返乡后的工作安排或投资计划,他们的回流是一个积极的、主动的策略,自然对于当地社会经济会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五、结论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农民工就开始出现正反两个方向迁移并行的趋势。与国外人口迁移略有不同的是,受限于二元分割的城乡制度,中国农民工反向迁移的比率或者说潜在比率要远远高于国外。毋庸置疑,农民工回流在短时间内还不能形成与“民工潮”相当的规模。从总体上讲,回流民工也不是一个强势群体,现阶段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并没有使多数外出就业者的资金积累、投资能力以及经营管理经验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平,农民工返乡创业在当前也不是农民回流的主体。但多数农民工在寻求异地就业时,其人力资本

得到了提升,这部分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素质和较为先进的思想观念,从而有可能成为农村工业化发展的一支生力军,为农村工业化进而为国家工业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随着第一代农民工由于年龄、职业素质等原因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加上政府近年来对于农村的政策倾斜以及产业梯度转移而导致沿海内陆之间务工收入差距的缩小,可以预计,农民工的回流将是一个大趋势。尽管如此,对于回流农民工的经验研究并不多。正如King(1979)的感叹:回流是“一个从未被写入迁移历史的伟大章节”。目前国内对于回流农民工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而且研究过多地侧重于宏观层次的回流原因与影响的考察,而缺少在个人水平层面的具体分析。回流农民工如何与家乡社区重新建立联系?将会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又如何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在传统与现代之间获得平衡?回流农民工个体与家庭之间、与社区之间又会产生怎样的互动过程?回流农民工在打工城市所积累的资本、技术、社会网络能否适应新的农村情境?回流农民工的社会资本是否能够给农村带来新的活力?其运行机制又是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都不是宏观数据所能解答的,而需要研究者进行更多的、细致的、务实的考察与探索。

参考文献:

- 白南生,何宇鹏.2002.回乡,还是外出?——安徽、四川二省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J].社会学研究(3):64-78.
- 白南生,宋洪远,等.2002.回乡,还是进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2.
- 蔡昉.2000.中国流动人口问题[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6.
- 蔡昉.2001.劳动力迁移的两个过程及其制度障碍[J].社会学研究(4):44-51.
- 蔡昉.2008.刘易斯转折点后的农业发展政策选择[J].中国农村经济(8):4-15.
- 陈如.1996.当前青年农民“回流”现象的考察[J].青年研究(6):35-39.

① 针对回流农民工为什么将他们的积蓄投入于建房而不是创业,国内研究者并没有进行解释。King在对马耳他的回流群体的研究中认为回流者不投资于生产,主要是由于下列三个因素:一是回流者所掌握的技术是与经济、工业、市场环境对应的特定的技术,而大部分回流者都是在偏远的农村地区,这种技术就可能不适用;二是回流者长期离开家乡去外面打工,与家乡的社会联系已经很淡薄,他们缺少建立企业所需要的在当地的行动网络;三是创新得不到当地权势者的支持甚至是抵制。

- 段成荣. 1999. 我国的“流动人口”[J]. 西北人口, (1):9-12.
- 葛晓巍, 林坚. 2009. 影响我国外出劳动力回流的因素浅析[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31-35.
- 胡显中. 1998. 民工回乡潮及其经济社会意义[J]. 经济纵横(1):19-22.
- 黄平. 1997. 寻求生存:当代中国农村外出人口的社会学研究[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 金沙. 2009. 我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D]. 兰州:兰州大学.
- 李家祥. 2007. 进城农民逆向回流及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兼与拉美城市化相比较[J]. 求实(1):88-89.
- 李强. 2003. 影响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1):125-136.
- 李若建. 2007. 广东省外来人口的定居性与流动性分析[J]. 人口研究(6):45-54.
- 李翔. 2009. 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多维分析和体系构建[J]. 农村经济(11):45-47.
- 刘铮. 2006.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现实悖论——“农民工回流”的成因及效应分析[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125-129.
- 秦德文. 1994. 阜阳地区民工潮回流现象的调查与思考[J]. 中国农村经济(4):11-14.
- 任远. 2006. “逐步沉淀”与“居留决定居留”——上海市外来人口居留模式分析[J]. 中国社会科学(3):67-72.
- 墨菲. 2009. 农民工改变中国农村[M]. 黄涛, 王静, 译.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00-109.
- 石智雷, 杨云彦. 2009. 金融危机影响下女性农民工回流分析——基于对湖北省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9):28-35.
- 王西玉, 崔传义, 赵阳. 2003. 打工与回乡:就业转变和农村发展——关于部分进城民工回乡创业的研究[J]. 管理世界(7):99-109.
- 夏怡然. 2010. 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J]. 中国农村经济(3):35-44.
- 许胜飞. 2005. 农民工回流现象的多角度分析[J]. 青岛行政学院学报(6):92-94.
- 于晓媛. 2003. 建国后我国农村人口回流分析[J]. 理论探索(3):51-53.
- 张茂林. 1996. 民工潮“逆潮回归”现象的理论意义[J]. 经济研究(7):31-32.
- 张宗益, 周勇, 卢顺霞, 陈义华. 2007. 西部地区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动因及其对策[J]. 统计研究(12):9-15.
- 周皓, 梁在. 2006. 中国的返迁人口: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J]. 人口研究(3):61-69.
- 周其仁. 1997. 机会与能力——中国农村劳动力的就业和流动[J]. 管理世界(5):81-100.
- 周霞. 2005. 回乡, 还是留城? ——对影响农民工理性选择的因素分析[J].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2(4):66-71.
- 朱宇. 2004. 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J]. 南方人口(3):21-28.
- BORJAS G, BRATSBERG B. 1994. Who Leaves? The Out migration of the Foreign-Born[J].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38:774-780.
- CHEN J-J, LIU H-Y, XIE Z-M. 2010. Effects of Rural - Urban Return Migration on Women's Family Planning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Attitudes and Behavior in Rural China [J]. Studies in Family Planning(1):31-44.
- DUSTMANN C, SAMUEL B, RICCARDO F. 1996. Return Migration: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J]. Economic Policy, 22:213-250.
- KING R. 1979. Post-War Migration Pattern and Policies in Malt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Return Migration [J]. European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Bulletin, 3:108-128.
- LEE E S. 1966. A Theory of Migration [J]. Demography, 1:47-57.
- LOCKWOOD V. 1990. Development and return migration to rural French Polynesia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2):347-371.
- MA Z-D. 2001. Urban labor force experience as a determinant of rural occupation change: evidence from recent urban-rural return migration in Chin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33:237-255.
- MA Z-D. 2002. Social-capital mobilization and income returns to entrepreneurship: the case of return migration in rural Chin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34:1763-1784.
- MURPHY R. 2000. Return Migrant Entrepreneurs and Economic Diversification in Two Counties in South Jiangxi, China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9:231-234.
- WANG W-F, FAN C. 2006. Success or Failure: Selectivity and Reasons of Return Migration in Sichuan and Anhui, China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38:939-958.
- WOON Y. 1993. Circulatory Mobility in Post-Mao China: Temporary Migrants in Kaiping County,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3:578-604.
- ZHAO Y-H. 2002.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Return Migration: Recent Evidence from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376-394.

Review of the Researches on Back-flow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QI Xiao-bing

(Sociology Institute, School of Graduat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206,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actors such as intergeneration substitution, industrial policies,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and so on of migrant workers, the back-flow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becomes a new development trend, meanwhile, on the basis of the limitation of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the reverse migration rate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or their potential reverse migration rate, i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abroad. Currently, the researches on the back-flow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focus on back-flow scale, back-flow reas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group back-flow, the social influence of the back-flow and so on. The researches on the back-flow of Chinese migrant workers, as a whole, stay at initial stage, pay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for the back-flow on the macro-level and to the survey on the back-flow influence but are short of practical analysis of the back-flow migrant workers on individual level and need deeper and more careful investigation, analysis and survey on their experience.

Key words: back-flow migrant worker; labor migration; push and pull theory; active back-flow; passive back-flow; social capital; urban-rural dual structure; household register system; land system; rural development

CLC number: F241.22; F323.6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8131(2013)02-0028-07

(编辑:夏冬,段文娟)

声 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同时,本刊为《万方——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科技论文在线》、《国研网》、《龙源期刊网》、《教育阅读网》、《中文电子期刊服务数据库》(CEPS,华艺数据库)等数据库全文收录期刊(其中《国研网》为选择性收录),论文在本刊发表后将通过上述数据库传播。

文章凡经本刊选用,即视为作者同意本刊代理该作品电子版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且本刊有权授权其他机构进行该作品电子版信息的网络传播。

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上述声明。若作者不同意其作品收录入上述数据库,请在来稿时说明,我们可做相应处理。

西部论坛编辑部